

#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八章 苏哈托的角色（下）

专家包括维特海姆教授注意到了。苏哈托这两个版本与拉蒂夫上校所亲自披露的完全相反。

拉蒂夫上校在高等军事法庭上提出：1、呈请苏哈托将军及其妻子作为证人，他们可以减免对他的指控。法院拒绝了这一请求。

2、在运动开始前两天，他去过苏哈托将军的家，并向他汇报了有关有将军委员会打算推翻苏加诺政府，还汇报了有一群年轻军官在策划挫败将军委员会的这项企图。

3、1965年9月30日晚上，当他在加托·苏布罗托医院见到苏哈托将军时，汇报了要在几个小时后执行挫败将军委员会政变企图计划。

4、拉蒂夫确认，苏哈托将军在听完拉蒂夫汇报后，完全有机会并有能力防止9月30日运动的发生。而苏哈托将军并没有阻止其发生。

5、在回答为什么苏哈托将军领导镇压“9·30日运动”后来会扩大为粉碎“印尼共产党9·30运动”的问题时，拉蒂夫上校提出，可能是苏哈托将军感到失望。失望的原因是亚尼死后苏加诺总统不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长。

值得注意的是，拉蒂夫上校在法庭上所说的话原本是保密的。

他在庭审之前也未谈和揭露这些事。

显然，拉蒂夫上校仍然觉得应该保持忠实于他所尊重和信任的前指挥官苏哈托。在1978年庭审他本人之前，他其实有机会在其他许多场合揭露这些重要秘密。有一次，他充当他的下属、情报步兵军官苏拉迪上尉受审时的



证人。苏拉迪在法庭上说，在9·30运动之前两天他曾送拉蒂夫上校去苏哈托家。当法官问拉蒂夫他访问苏哈托谈论了什么时，拉蒂夫说，讨论的是他在雅加达的住房问题，因为他刚刚从三宝壟搬过来。法官说拉蒂夫的回答不太合逻辑。在9·30运动之前的决定性时刻，拉蒂夫作为9·30运动中央指挥部第二号人物，怎么可能去面见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指挥官苏哈托，只是谈论住房问题呢？

1978年拉蒂夫在高等军事法庭所揭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此事在1971年大选之前，即苏哈托当选为总统之前被揭露出来，印尼政局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

许多武装部队的中、高级军官被指控参与了9·30运动并被审判和监禁，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有将军委员会的存在而没有向上司报告。

例如，廖内群岛海事指挥官苏亚迪准将。他被判处18年徒刑，因为他没有向他的上司报告他从下属知道有将军委员会的存在。

警察准将苏瓦诺被判刑也是因为他既没有向上级报告将军委员会的存在，也没有对将军委员会采取行动。

那么苏哈托将军怎么样呢？他并非只是从拉蒂夫那里知道有将军委员会的存在。他还

在9·30运动实施之前便知道了此运动的具体方案。但是，他并没有报告给他的上司艾哈迈德·亚尼将军。他甚至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绑架和杀害他的上级领导。

于是出现了怪现象。苏哈托将军知道有将军委员会，也知道有9·30运动将绑架他的上司亚尼将军和纳苏蒂安将军，但不采取任何行动，却没有受到起诉和判刑。而上述的其他中高级军官都受到严厉的惩罚。苏哈托不仅没有被追究和惩罚，反而扶摇直上当了很长时间的总统。

拉蒂夫上校在高等军事法庭的陈述本应该是指控苏哈托卷入9·30运动的法律依据。比起其他因卷入9·30运动而被起诉的和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监禁的高级军官来，苏哈托有严重得多的错误。作为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指挥官，苏哈托事先已经知道9·30运动的计划，拥有很多机会和军事实力可以阻止和破坏9·30运动的发生。

显然，苏哈托在他的上司被绑架并杀害之前不去阻止或破坏9·30运动的原因很清楚，他希望有机会升迁到顶端。

苏哈托为了从他所介入的各种事件中获取个人利益，不惜伤害信任他的亲密战友，并且无需任何掩饰。他的这种个性和能力十分昭

然。

9·30事件证明了这一切。苏哈托假装站在年轻军官一边，不赞成那些成立将军委员会的将军们的立场，也忠于苏加诺。但暗地里，他却利用他们来铲除他在军队里的所有对手，包括他自己的上司。一旦把他们除掉了，苏哈托便坚决而毫不留情地从背后袭击这些年轻军官。事实上，他残酷彻底地消灭了印尼共产党，然后推翻了苏加诺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事态发展表明，苏哈托起在9·30运动中扮演了直接关系到消灭印尼共产党的重要角色。以下几点足以支持这一结论：

1、苏帕尔佐将军执行总统命令，在1965年10月1日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而苏哈托将军正相反，展开了长时间的军事行动，直至大逮捕和大屠杀。针对印尼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直至苏加诺总统发表了苏哈托也未能全部遵照执行的《3月11日命令书》。

2、我们稍加注意便能发现，9·30运动领导人被判刑罚的轻重，并不取决于其在印尼共产党内地位的高低，或者是在对苏哈托势力进行武装抵抗中的角色是否重要。衡量的标准是在庭审中辩护的内容。当辩护词的表达较多地提出对印尼共的自我批评时，作出的判决便较轻。例如祖吉托和勒旺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那些揭露苏哈托势力谎言的人，如穆尼尔、鲁斯兰·维查亚萨斯特拉、伊斯坎达尔·苏贝克提和马尔若科等人，则被判处死刑。他们的辩词被诬为煽动叛乱。

在20世纪70年代形势的发展变得有意思。当时有一些陆军军官不能接受苏哈托将军当国家元首。一些认识苏哈托的、因9·30运动而坐牢的中级军官多次被监狱里的调查组传唤，以说明苏哈托当蒂博尼哥罗指挥官和曼达拉指挥官时的行为。有关苏哈托的下属阿里·穆托坡中校在破坏苏加诺总统在“粉碎马来西亚”时期政策中所起作用的证明材料在这些调查中也受到质疑。但是，苏哈托的敌人当然是从未也根本不可能使用这些在监狱里的军官们的证明材料来推翻他。

1977年第二大选前夕，出现了萨维托事件。萨维托被起诉受审，原因是他揭发了苏哈托家族大量敛财的问题。对萨维托的指控是：他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发动一场政变。

萨维托成功收集了许多显赫人物的签名，其中包括穆罕默德·哈达、西玛图庞将军，天主教领袖达摩朱沃诺红衣主教，以及穆斯林领袖哈姆卡和前警察总长苏卡姆托等，要求改变经济政策。

他们指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政策显然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却使苏哈托家族更加富得流油。他们还要求苏哈托把政权交给哈达。交权的手稿按照《3月11日命令书》的模式书写。1966年此命令书成了苏加诺总统把政权交给苏哈托将军接管的基础。

但是，苏哈托实在是太强大了，继续当他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萨维托等人根本动摇不了他的地位，只能去坐牢。